

蒙田教育思想评介

姜文 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法国与意大利接壤，近水楼台却未能尽先得月，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浪潮被法国的保守派顶了回去，它绕过法国而先在北欧蔓延开来。宗教改革运动发轫于德国，马丁·路德首先吹起了反叛天主教的号角。而与德国毗邻的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声势却大为逊色。法国的保守派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沆瀣一气，残酷镇压革新的思潮和运动。巴黎大学是当时欧洲的最高学府，也是经院主义的顽固堡垒，它反对任何人文主义的思想倾向。即使象法王法朗西斯一世那样的人物，想提倡人文主义新学，也不能涉足到巴黎大学，只得另起炉灶，建立法兰西学院。然而，压抑和禁锢只能得逞于一时，强烈的压迫必然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法国的文学界首先突破封建主义的防线，人文主义的文学家，振臂呐喊，奋笔疾书，锋芒所及，直指经院主义教育。主持之一是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Rabelais, 1494—1553），他在其小说《巨人传》中，辛辣而幽默地抨击了法国封建贵族的腐朽、天主教会的伪善和经院主义教育的戕生害命。稍后于拉伯雷的另一文坛巨匠蒙田更是泼辣大胆。他引经据典，借古讽今，时而嘻笑怒骂，时而旁敲侧击；时而直陈时弊，时而正话反说。蒙田没有亲身从事教育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散见在杂文之中，而没有系统的教育专著，然而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却影响非凡。

蒙田是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洛克的先驱，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教育也有深刻的影响。美国文学家爱默生（Emerson）曾评论说。“蒙田是所有作家中最诚实、最坦率的人。”（Andre Gide, *The Living Thoughts of Montaigne* 1946, p.3）

蒙田其人及其著作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是法国十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散文作家和教育思想家，生于法国西南部海港城市波尔多（Bordeaux），出身于新贵族家庭。蒙田幼年接受家庭教育，他的父亲极为重视语文的学习，为蒙田专门聘请了拉丁语教师。蒙田是在著名的人文主义学校——居耶纳学校（Collège de Guyenne）接受早期学校教育的，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习了七年。十三岁时毕业后，在本地的文科学校学习哲学。以后，蒙田又进入法国南部的土鲁斯（Toulouse）大学，攻读法律。他精通拉丁语和法语，擅长法学。1557年起，蒙田在波尔多市议会任职达十六年之久。在1580—1581年间，蒙田曾先后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观光，考察风土人情，以增益见闻。蒙田曾在意大利谒见教皇，被教皇授予“罗马市民”的荣誉称号。1581年起，蒙田当选并连任两届波尔多市市长。在职期间，他多次

上书国王，请求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废止捐税的不平等措施。他也同情新教徒。1588年，蒙田参加了国王亨利三世和新教领袖亨利·德·纳瓦尔（Henri de Navarre）的谈判。后来，蒙田辞官回乡，深居简出，博览群书，闭门思考著述。

蒙田的主要著作是《散文集》。该书结构松散，篇幅不等，体裁各异，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立身处世等等，不一而足。他的《散文集》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散文作品，其中也蕴含着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部书是十六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的总汇，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我们在英国培根的著作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蒙田的思想影响。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也继承了蒙田崇尚理性和经验的思想。

蒙田的怀疑主义

蒙田哲学观的突出表现是怀疑主义。他提出了“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的名言。他把这句话铸在自制的一枚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铸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表示人们的认识是捉摸不定难以持平的，用来作为“我知道什么？”这句名言的象征。蒙田熟知塞克斯都·恩披里可（Sextus Empiricus，约3世纪）、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1467—1536）、阿格里帕（Agrippa of Nettesheim，1486？—1535）、布鲁耶（Cvuy de Brues）等人的著作，并颇感兴趣。蒙田的怀疑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的思想的渊源。蒙田信服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怀疑主义。塞克斯都·恩披里可著有《皮罗学说概略》，介绍和评价怀疑主义者皮罗（Pyrrho，约公元前360—270年，爱利斯人）的观点。塞克斯都·恩披里可

为主要的哲学派别有三：即独断派，学园派和怀疑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等，相信他们已发现了真理，被称为独断论者，学园派，即柏拉图学派的信徒认为真理是不可知的；怀疑派则主张要继续从事研究。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或“存疑派”、“犹疑派”。皮罗集其大成，比他的前辈更彻底、更显著，所以怀疑派又被称为皮罗主义者。怀疑派的起因是“希望获得安宁”。一些有才能的人，为事物中的各种矛盾所困惑，不能作出抉择，于是进而研究事物中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得到安宁。怀疑派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对立。”对此，应当持悬而不决的存疑态度。怀疑认为对立可以有三种情形：一是把现象与现象对立起来，例如“同一座塔，从远处看起来是圆的，从近处看起来是方的”；二是把思想与思想对立起来，例如有人根据天体的秩序论证有天意存在，而怀疑派则说，顺境常常是坏的，逆境常常是好的，从而推论出天意不存在；三是把思想与现象对立起来，例如象阿克萨戈拉那样，提出论证说“雪是冻结的水，而水是黑的；所以雪也是黑的”。面对着种种“对立”，怀疑派认为，只有“不作任何判断才能使灵魂安宁”。因为：第一，人们的感觉并不可靠，黄疸病患者把正常人看作是白色的东西称为黄色；对于流星的出现，有人认为是寻常事件，有人却大为惊异。第二，任何事物的美或丑，正当或不正当，往往依人们的风俗习惯而定，并无一致的标准。印地安人和他们的老婆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干风流艳事，而绝大多数民族则把这看作是耻辱。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得出结论说：“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以上引文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

务印书馆，1862年版，上卷第175—177页）。蒙田把塞克斯都·披里可的名言“我不置可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斋里，于此可见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对蒙田怀疑主义的深刻影响。

蒙田所崇奉的另一名言是“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这一思想承受西塞罗的《经院哲学论》的影响。该书曾评介哲学家阿瑟西拉(Arcesilas，公元前316—241年)的怀疑论。阿瑟西拉认为，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相信“我一无所知”，而他则认为，不仅如此，甚至连“万物皆不确定”这一点也不能确定下来。

蒙田继承了古代的怀疑主义，又受到当代新的怀疑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宗教只能依靠信仰，不能求证于理性，而且怀疑自我认识的极限。蒙田喜爱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句名言：“我爱知识，也爱怀疑。”蒙田曾谈及他旅行到比萨时的一件往事：他遇到一位熟悉的诚实的人，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这位学者认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致，这是一切可靠想象和完全真理的真正试金石和基础，无论什么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一致的东西，都只是愚蠢空幻的想象和无益的心情，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了一切，预见了一切，说明了一切。蒙田不同意这位学者的态度，他说：“我希望做教师的使他们的学生谨慎地、严密地吸取一切东西，决不要相信只凭权威或未经考察的东西。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并不比斯多噶(Stoics)派或伊壁鸠鲁(Epicureans)派的学说更加是一样的公理。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向他提出，如果他有能力，他将区别真理与谬误，不然，他将保持怀疑的态度。”蒙田这种不迷信权威的态度，在当时反对传统偏见、提倡人文主义新学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他的态度并非怀疑一切，他本人遍读古代经典，在文章中一再援引古代作者

的佳言名句，即可佐证。他所反对的只是盲从偶像而不求索解。他说：“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东西，也寻找不到什么东西。”他主张理解既有的知识，变成学习者本人的信念，因为“真理和道理是属于一切人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至今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也不专属于此后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蒙田以蜜蜂为例，它们采花酿蜜，蜜来自花，但既经酿成就不再属于花了，而为蜜蜂所独有。这个比喻含义深刻，十分贴切。

蒙田所处的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兴起，人类经验日益扩充。旧的知识不断被新的知识所取代。蒙田认为人对于作用于人感官的客观事物，其感官的经验是有限的；而对于事物的本质并不知晓。“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哥白尼(Copernicus，1475—1543)否定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天动说”；而哥白尼的“地动说”在某种更新的理论出现后，也许会被推翻。蒙田的怀疑主义正是当时时代特点的反映。

蒙田所憧憬的“新人”形象

蒙田所憧憬的教育目标是体智全面发展的新的贵族，或称为新的绅士。蒙田赞同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4?—355?)的意见。色诺芬认为波斯人的教育制度是优良的，因为其他国家教儿童文学，而波斯人教儿童德行。波斯人的儿童出生后，注意身体发育的健全，体态的优美；七岁时，儿童学习骑马打猎；十四岁，儿童的教育由四个人主持，“一个全国最贤明的人，一个最公正的人，一个最有节制的人和一个最勇敢的人。第一人教他宗教，第二人教他正直和忠诚，第三个人教他成为自己欲望的主宰，第四个人教他具有大无畏精神。”蒙田也把古代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作了对比。他说：“在雅典，人们学习说得

好，但是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做得好；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从诡辩派的论争中解脱，打破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欺诈，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摆脱淫乐的诱惑，并且以大无畏的勇气战胜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在雅典，人们为空洞的言词而绞尽脑汁，在斯巴达，人们的职责是探究具体事物；在那里，口舌永远在喋喋不休，在这里，心灵不断地受到训练。”乍一看来，似乎蒙田赞颂斯巴达而贬黜雅典。实则不然。从蒙田的一系列言论来考察，他的原意乃是强调教育要注重实效，培养真正的“人”。蒙田十分欣赏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Terence, 公元前195—159)的名言：“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有血肉相关。”蒙田所讲的“人”，并非抽象的，而有其具体的内容。他主张把青年培养成为“国王最忠诚的臣民，最热情和勇敢的绅士”。他们应努力抑制欲望，不从事任何于公共福利不利的行动，具有良心和德行，使理性成为主要的向导。这里所讲的“理性”乃是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后来，“理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旗帜上的鲜明标志。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一语中的地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57页。）蒙田所指的以理性为向导的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或新贵族所期望的人物。

蒙田理想中的新人是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人。他主张教育要兼顾心智和身体，“只使他们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

强他们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蒙田现身说法，以他自身为例：他患有气喘病，体质柔弱易感，他认为这对他的“心智活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过：心智与身体决不能一个得到训练，而另一个没有训练，两者同样需要指导，好象两匹马配合起来合力拉车一般。蒙田服膺柏拉图的理论，和柏拉图如出一辙，他说：“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

蒙田认为教育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儿童天性的征兆无确定的踪迹可寻，性情多变，指望无定，希望虚幻，前途可疑，即使是富有才智的教师也很难对儿童的心性作出确定的判断。蒙田不无感慨地说：“在人类，生之者易，但是，既生之后，要把他们教育成人，该有多少悉心的养护，多少辛勤的培养和多少疑惧每天在等待着家长和教师啊！”

蒙田又认为，在教育工作中，知识的传授和品德的形成二者比较，相对地说，前者较易而后者困难。知与行二者比较，行更重要。他批评某些人文主义者过分注重人文学科而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他主张既要培养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成为长于文字的人；又要顾及实践能力的锻炼，培养擅于行动的人。

蒙田认为，一个人认识世界，获取科学知识固属重要，但是，身体力行，把拥有的知识付诸行动，则是更重要的事体。他说：“人们在科学上是伟大的，那么在行动上就更要伟大。”他列举事实加以说明，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应用他的知识，创造了“一些可怕而奇异的机器”，使西拉古斯人在三年内（公元前214—前212）胜利地抵抗了罗马人的侵犯。阿基米德本人却看不起他的制造品，认为这些制造品“亵渎了他的艺术的尊严”，认为自己仅仅充当了技工的角色，他

的制品只是无足轻重的实验和玩具。蒙田认为，阿基米德的科学知识是伟大的，他的科学知识用于保卫希腊免受罗马人的侵犯的行动更要伟大。

蒙田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学习广博的知识是一切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理想，蒙田也持同样态度。他主张学习巨大的世界，蒙田写道：“我愿意把这个世界结构作为我的学生的精选的教科书；那么多奇怪的性格、各色各样的宗派、不同的判断、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法律，以及奇异的风俗习惯，它们教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启迪我们的判断力去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天生的虚弱。”蒙田认为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书房”。他主张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一切事物的性质和原因”，调查周围任何罕见的独特的东西，研究国家风俗、财产、政权和所有国王的属地和联盟。他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也把人文学科放在各种课程的首位，认为人文学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用，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利用生活，一切其他事物也服务于同一目的”。关于语言，蒙田所提倡的是“一种自然、平易和不矫揉造作的语言，无论是口头讲的，还是写在纸上的，是一种有表现力、简洁、紧凑和实质的语言”。蒙田尤其喜爱诗歌。关于历史，蒙田认为可作为主要的阅读材料。学习历史，学生可以“熟悉历史许多全盛时代的最可尊敬的人”。他认为，学习历史的重点在于学习美德，而不是记住年代。一个好的教师“灌输到学生脑子里去的东西，主要的不是迦太基灭亡的日期，而是汉尼拔和西比奥留下的教训”。关于哲学，蒙田认为“应该成为人类行为的试金石，成为使行为正直的规则”。因此，他主张把一切有用的哲学论文，作为学习的范例。蒙田对柏拉图的哲学论述深怀同感，认为恒心、信念和诚挚是真

正的哲学。蒙田也主张顾及身体方面的教育，“一切运动和锻炼，如长跑、击剑、音乐、舞蹈、打猎、骑马，都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

蒙田既尊崇博学多能，又倡导虚心向善服从真理。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真正有学问的人就象麦穗一样：只要它是空的，它们就茁壮挺立，昂首睨视；但当他们臻于成熟，饱含鼓胀的麦粒时，它们便谦逊地垂着头，不露锋芒。”蒙田认为沉默与谦虚是与人往来时极有利的品质；而固执顽强地作文字上的争辩，乃是卑鄙的人的最显著的一般品质；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热烈争辩时抛弃不正确的论点，更是罕见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品质。蒙田主张教育学生具有服从真理的品质，“当发现真理时，不管真理在对方，还是由于考虑周到，真理在于他自己，都要立刻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解除戎装。”

蒙田在教育方法上也表现了独特的见解，提出了许多开人新意的主张。

蒙田反对娇生惯养，不同意把“一个孩子挨紧抚抱，娇养溺爱，使其在父母的膝上长大”。他引罗马诗人贺雷舍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8）的话说：“让他在露天，在充满失望的事情中生活。”蒙田对父母的溺爱给儿童带来的恶果作了深刻入理的分析，他说：“父母天生的慈爱和柔情，甚至对最聪明的人，也往往觉得是那么懒散和过于啰嗦，因为父母不能、也不想制止、纠正或惩罚他们孩子的过错，他们也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教育的那么吝啬，一点也不懂规矩，而且很多时必然会碰到一些危险。”父母看到孩子因学习而流汗或吃苦，就会感到心疼和忧虑。

蒙田主张深入理解所学的知识，据为己有。他说：“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的心智变得更好，不能使我们的判断力更加健全，我

宁愿我的学生把他的时间用在打网球上；因为，这至少可使他的身体得到更好的锻炼”。蒙田特别重视对知识的理解，变知识为自己的东西。他说：“我真不喜欢这种相对的、行乞得来的理解。虽然我们可以藉别人的学问而成为博学之士，我相信，我们只能藉我们自己的智慧而成为明哲。”

蒙田欣赏西塞罗的意见，认为：“仅仅把知识拴在心灵上是不够的，应该融合到心灵中去；不应只是把心灵着一下色，而是必须把它染透；如果不能改善心灵的不完善的情况，最好还是任其自然。”他引西塞罗的话说，“知识象一把危险的剑，他可能伤害带剑的主人，如果这把剑落在拙笨的和不娴熟的手中，还不如没有学过的好。”

蒙田辛辣地讽刺一旦离开书本就毫无所知的人，说这种人必须先查阅字典，弄清“臀部”是什么，再查看“痔疮”是什么，然后才能说出他的臀部患有痔疮。

蒙田讲述了一位罗马富翁的故事：这位富翁本人不学无术，花钱雇用了各门科学的专家，为他装点门面，凡是需要某个方面知识的时候，就把具有这方面特长的专家请出来，代他写文章、写诗等等，知识存在于他的雇用的仆人的脑子里，而这位富翁竟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学问。蒙田说：“那些把学问藏在他们豪华的图书馆里的人正是这样”。

蒙田反对死记硬背，他认为“死记硬背，并不是完善的知识，这只是把别人要求记住的东西保持在记忆里罢了”。蒙田认为仅仅进行书本学习是贫乏的。书本学习“不过是行动的装饰，而不能成为行动的基础。”蒙田告诫道：“不要孩子多背诵功课，而是要他行动。他应该在行动中复习功课。”蒙田认为旧的经院主义教育训练出来的人“记忆非常丰富，但是他们的判断力却是完全空虚的”。蒙田强调培养理解力和判断力，他

说：“我们应该考查的，不是谁知道的多些，而是谁知道的好些”。蒙田说，考察官员，一是考察他们的知识，二是考察他们的理解能力，二者都是必要的；但他认为判断力最重要，因为“没有知识，凭判断力还可以尽力设法应付，但仅有知识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经院主义呆读死记的教学作了深刻的抨击，他说：“我们辛苦劳动、勤奋工作，只是去充塞自己的记忆，而理解力和良心却任其空虚”。他举鸟为例，到处飞着去啄食谷粒，没有尝一下就去哺喂他们的小鸟。学究们的行径如同鸟儿一般，“从书本中拾取知识，永远停留在嘴唇上，只是为了吐出来，传播四方”。学究们一手转一手地传播知识“目的就是卖弄好看，和别人应酬”。

蒙田十分看重理解力的培养。他转述希腊喜剧作家埃毕卡沫斯(Epicharmus, 约生于纪元前五世纪)的话说：“理解力能看清一切，听到一切；理解给一切带来益处，它安排一切，推动、统帅和管理一切。所有其他的東西都只是盲目的，没有知觉的、没有灵魂的。”蒙田援引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点，主张对青年提出问题，叫他们判断人以及人的行为，以磨炼青年的理解力。

蒙田提倡独立思想而反对依附权威。他悲叹道：“我们的心灵的确在随别人的意志在行动，被迫着在听从别人的幻想，服从别人的权威，被迫着屈从他们空洞说教的引诱，我们不得不重复地弹着老调，我们没有自由地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消失了。”

蒙田批评传统的教师在“学生的耳边喋喋不休，学生好象向漏斗里灌东西似地听他们讲课，而且，学生的任务仅仅在于复述他们学过的东西”。蒙田主张，教师“应该按照他们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使他们的能力表现出来，让他对许多东西都学一点，

然后独立地做出选择和区别，有些时候给他开条路，有些时间要让他自己去开路。”教师应该让学生有谈话的机会。教师过多限制，往往窒息学生的能力成长，“教者的权威往往阻碍着要学的人”。蒙田认为“由于教师剥夺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自由，从而使他变得更加奴性，更加懦弱。”

蒙田认为教师必须善于掌握分寸，“最好让孩子在他面前走几步，以便更好地判断他的速度，从而推测他能坚持多久，然后方能适应他的能力”。“要懂得如何支持儿童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他们的行动，又该如何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是一种高贵的精神的标志，也是一种坚毅的精神的结果”。蒙田主张教师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应用谈话，采用书本，介绍合适作家的作品等，有时也可给学生“已经咀嚼过的精华”。

蒙田强调练习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学习跳舞，不能只是站在旁边看舞蹈演员如何跳，而自己并不练习去跳。蒙田甚至认为：无论哪种动作或事物，都足以代替书本。他说：“一个男孩子的有趣的把戏，一个小侍者的无赖的诡计，一个仆从的愚蠢的行为，在餐桌上或交游中开着玩笑或者当真讲的一番废话，甚至都可成为运用我们心智的新事物。”

蒙田不仅要求学生能复述教师讲过的东西，而且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知识的意义和实质，“在判断学生的收获时，不是用他的记忆来证明，而是用他的生活来证明”。教师应该让“学生把他新近所学的东西用很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在很多不同的学科中去应用它，从而了解他是否懂得所学的东西，并使其成为自己所有”。蒙田还主张教师把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作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教学方法的模范。

蒙田认为旅行是一种受教育的重要方式。诸如：和人们交谈往来，到国外去旅

行，以及观察奇异的式样等。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当地“人们的性情、举止和风俗”，“和别人的机智摩擦一番而使自己的机智犀利起来”。蒙田认为儿童从婴儿期就出国旅行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最后，应当提及蒙田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完全在于导师的选择。蒙田说：“我宁愿推荐一位心神镇静、稳健的导师，而不愿推荐一位头脑塞得满满的人”。“我还是喜欢有智慧、有判断能力、习惯文雅和举止谦逊的人，而不喜欢空空洞洞、只有书本知识的人。”

* * *

蒙田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位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他没有参加过教育实践活动，却以其凌厉的巨笔捅戳了当时封建教育的种种毒瘤。他没有写下系统的教育专著，却在其散文中星罗棋布地镶嵌了教育思想的名言警句。蒙田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他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教育献计献策，却绝少提及劳动人民的教育要求；他的人文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实则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为髓的；他的怀疑主义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却同真理的绝对性对立起来，未免失之偏颇；他关于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论述颇多真知灼见，然而却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如此等等，当然主要是时代使然。不成熟的时代自然不会出现成熟的理论。然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经过短暂的沉寂，法国启蒙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和更大的规模出现于法国。蒙田的思想无疑对后来的运动起了酵母的作用。

历史上常有一些偶然的巧合事件。蒙田死于1592年。这一年，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诞生了。夸美纽斯吸取前人的经验加上个人的创造，建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学

（下转第21页）

第三，用经济手段管理私营经济，要与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不能挫伤私营经济的经营积极性。国家在原料供应、货源批发上，应该合理分配，统筹兼顾，不能歧视私营经济，金融部门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上，也应体现支持、调节的思想。对私营经济征收所得税要合理，它们的税后利润水平一般不应低于同类型的公有制经济的利润水平，使雇主有利可图。一般应鼓励积累，抑制消费，因而对其用于消费部分征税应高于积累部分。在必要时，国家可以对私营经济实行价格指导。

第四，对私营经济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管理引导，保证它们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十三大后，私营经济必定有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规模也将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它们也会雇佣更多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所允许的。但是，应明确公有制经济的领导作用和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公有制经济的任务在于影响、制约私营

经济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济条件为私营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对它们进行引导和管理，帮助其克服盲目追求利润的缺点。公有制经济对私营经济的一切正当经济活动，要在资金、技术、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市场管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根据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通过经济合同制尽可能把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联系起来。这样，既扶持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克服其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又发挥了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注：

①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③ 同上①第8页

④ 同上①第32页

⑤ 同上①第32页

(上接第64页)

体系。他的《大教学论》于1632年问世。1632年，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洛克诞生了。洛克建立了绅士教育理论的体系。教育思想史表明，教育理论的发展总是一代接着一代，

撰写本文的参考资料：

1. William Boyd and Edmund J.

King;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222—228.

2. 格莱夫斯：《中世纪教育史》，吴康译，商

务版，365—371页(选用时译文有更动)

一代胜过一代的。而后代的人总是以前代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基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蒙田不仅为文艺复兴时代留下了值得讴歌的业绩，而且对后世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铺石垫路的贡献。

3. P·博克：《蒙田》，孙乃修译，工人出版社版。

(文中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采自蒙田的《散文集》，译文见《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版，352—412页。)